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29 期 (总第 379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2 年 5 月 31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中国自 1977 年恢复高考已经过去三十五个年头了，高考可能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有效途径。当你看到本期专题时，距离 6 月 7 日的高考只有一个星期了，高考每每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莘莘学子人生的走向。

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想。所谓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这里所说的“合理”是指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符合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和需要，并从两者的辩证关系出发来统一配置教育资源。

我们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意识到了危机就有希望带来转机。目前，教育改革只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一步步前进，要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于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定信念，不畏艰难，从最核心的矛盾入手，相信教育公平问题是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本刊特此推出《教育公平》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推荐的文章相信也会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要目

●本期专题/教育公平

洋高考也疯狂

武大原校长刘道玉：

高考取消会导致“开后门”成风

“拼房招生”严重损害教育公平

“80平方米”的门槛挫伤了教育公平

积分入学彰显教育公平

优化网点布局 构建“大均衡”教育

教育公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

●国是论衡/罗崇敏：价值主义教育要使教育回归本真

●政坛经纬/解密中南海调研政治

●人物春秋/揭秘 301 医院

●本期专题/教育公平

洋高考也疯狂

中国的高考很疯狂，其实，洋高考也疯狂。不少国家每年都会在某个时期进入“高考时间”，与中国近邻的日本和韩国，高考所引发的紧张气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紧张的高考备考中，我们不妨轻松一下，聊聊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的洋高考，看看国外的高考是怎么样的？又有哪些有意思的高考文化？

韩国：“比死刑还残酷”

一年一度的韩国高考被媒体戏称为“比死刑还要残酷”。韩国高考全称“大学修业能力考试”，考生要在一天内考完 4 门科目，然后经过大学的层层面试才能被录取，2009 年普通高中和专门高中的毕业生考取大学及专科学校的比例为 81.9%。特长生通过“特别选考”（相当于中国的“自主招生”）进入大学，占 35%左右，有些大学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提前录取，占 5%左右。

韩国高考不计算总分，而是各科目分别打分，然后依据分数段确定各科目的等级以及综合等级。各大学将根据各科目考试等级、学生手册、面试成绩、专长等情况招收学生。

试题以教科书内容为主，涉及领域广，难度也大。很多考生和家长都认为，在高中课堂上的学习根本不能达到顺利通过高考的要求。因此，上各种补习班以及请家教的情况在韩国高中十分盛行，于是有了“课上睡大觉，补习班上拼命学”、“重读更利于高考”的说法。

韩国十分重视学历，对多数韩国父母和高考考生来说，考上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和

延世大学这三所大学，被视为韩国高考考生至高无上的人生成就。有了名校的出身，就意味着考生可以拥有遍布韩国政界、商界的庞大校友网，连婚姻行情也会看涨。

韩国高考在每年 11 月中旬举行。高考当天，韩国全国上下大动员，商店调整上班时间，以便减轻交通拥堵状况；韩国警察机构要求驾驶员不得在学校附近鸣喇叭；驻韩美军则要停止实弹演习和航空任务。

日本：高考要考两轮

和韩国高考考生一样，日本的高考考生同样要面临“地狱考试”。日本高考题目曾一度向难题化、偏题化发展，日本电视台不少娱乐节目经常搬出高考原题为难嘉宾，讽刺“这种题目连研究人员都不一定能做出来”。

在日本，一个人拥有的学历会直接影响到其职业的好坏和薪水的高低。日本人比较看重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老牌国立大学，日本政府和不少一流大公司经常仅限于在东京大学这样的名校中招聘新人。于是，在日本有“四当五落”的说法，意思是如果每天拼命学习只睡 4 个小时，就能考上大学，要是多睡 1 小时，每天睡 5 个小时，就会落榜。

报考公立大学的学生要参加两轮“高考”，第一轮是类似中国“会考”的全国性考试，不分文理科，接受第一轮淘汰。“会考”的总分很重要，大部分公立大学设立了最低分数线。成绩公布后，考生可向心仪的大学提交报考申请，由学校自行组织第二轮考试，是否录取则综合两轮考试的成绩而定。两次考试都合格了才能顺利进入大学。

与国内高考现场家长云集的情况不一样，在日本的高考现场，几乎看不到家长的身影。高考当天，大部分考生和监考老师都会穿黑色衣服。据说，考试当天打扮得太花哨的人大都心虚，对高考没有信心，为了给自己鼓劲，看上去沉着冷静的黑色几乎成了考生的统一标志。

美国：SAT 考智力题

美国不实行全国大学入学统考，对中学生申请大学影响最大的考试——“学业能力评估考试”（SAT）和“美国大学测评考试”（ACT），均称为“美国高考”。

SAT 考试每年举行 7 次，考试内容类似于智力题，千奇百怪，与高中教材没有关系，主要考查学生的逻辑、分析、推理能力，如：“癞蛤蟆是否有听觉？试证明之”；“请以下面的句子开头写个故事：‘在多年以后，他想起自己第一次与冰有关的经验……’，故事须提及一双袜子、一个纪念碑、一串钥匙、一头家畜和莎翁全集”等。在美国，一些十二三岁的初中生也常进入考场“小试牛刀”。ACT 考试一年有 5 次考试机会，只要选最好的一次成绩申请即可。和 SAT 不同，ACT 考试更像是一种学科考试，强调考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考试科目有英语、阅读、数学、科学四门。从难度上看，ACT 比 SAT 容易一些。

美国学校录取不拘一格，考试分数只是录取的一个方面，高中的成绩单、教师或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推荐信、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等都是学校考虑的因素。美国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所以许多美国学生根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备考，家长们对孩子也不会施加压力。

英国：考试前学生回家自己复习

大家熟悉的 A-LEVEL 考试在高二进行，即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成绩采取百分制，分为 A、B、C、D、E、U 六个等级，较好的大学要求 3 门课的成绩均达到 C 级以上；牛津、剑桥、哈佛等名校，则要求 3 门课的成绩达到 AAA 或以上。每年 6 月和 1 月(或 11 月)各有一次统考。若一次考试发挥不好，下次可重考，两次考试之中取高分。大部分英国学生通过选修 3 到 4 门，用两年的时间修完 A-Level 课程，但能力很强的学生也可在更短的时间内修完。

只有在 A-LEVEL 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才能被一流大学录取。A-LEVEL 考试前两周学校会放假，让学生回家自己复习，老师不搞猜题活动。

据启德广州英爱教育中心副经理陈燕雯介绍，如果学生有意向申请牛津剑桥等名校，还需接受学校面试，主要考察逻辑思维能力、英语表达能力以及学术基础能力。赴英国读高中的中国学生，在面临升大学的考验时，选择理工类专业会有更大优势（对表达能力要求相对低，对逻辑思维及学术基础要求相对高）。

英国的大学会根据推荐信（通常由导师所写）、个人简历、面试表现来综合评价学生。面试官通过面试考查学生综合素质、性格、学术研究潜力等，这个环节对录取结果影响较大。

澳大利亚：考试科目可自选

高考科目在 11 年级（相当于国内的高二）确定，由学生自己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高考科目按难度分级，澳大利亚教育部门为了保证公平，给出了“加分”政策，选择高难度系数科目的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以得到加分。

学生可从近 40 门课中选择五门，院校再根据学生这五门课的 11 年级（即中国高二）下学期及 12 年级（高三）全年的平时成绩以及高中毕业考试（类似中国的高中会考）的成绩进行综合评定，各占 50%，学生凭借这两个成绩申请大学。学生在得知高考分数后，可以根据分数更改志愿。

各州针对不同区域的高中生有不同的大学录取条件。例如，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地区的大学，针对本州高中毕业生，就不需要高考，只需看高中的平时成绩。而如果学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就读高中，想升读本州的大学，则看重的是学生的高考成绩。

各大学针对部分竞争激烈的学位专业，录取条件也会有所提升。例如，学生有意申请大学医科课程，大学可能会较为看重学生高中课程是否涉及医学相关或理学范畴，高考分数达到 98 分以上，其他科目在 80 分以上，才有录取机会。

西班牙：单词看不懂，老师会解释

西班牙的高考制度由两部分组成：必修课考核和选修课考核。必修课考核占高考成绩 40%，其余 60% 则来自高中平均成绩，满分为 10 分。必修课考核是进入大学的关键，另一部分是选修课考核，可在总成绩的基础上加 4 分，学生所能考到的最高分就达到了 14 分。选修部分对热门专业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必修课包括西班牙语、哲学或者历史、外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或者葡萄牙语）。选修课可以任选一门：人文艺术专业、社会科学专业、自然科学专业、医学专业、工程和建筑专业等。

西班牙高考题量少，考试强度小。数学只有 4 道大题，英语也只有三种题型——阅读理解、完型填空和一篇由 100-150 个单词构成的命题作文。

西班牙高考的考场气氛轻松，考生如对试卷有疑问，可以向监考老师咨询。例如，学生对词语不理解，老师会告诉他们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尽管气氛宽松，西班牙对考试作弊的处罚十分严厉。如发现有考生作弊，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立即停止其考试并取消其考试资格。

洋高考难倒中国考生？

阅读、写作成丢分“重灾区”

赶考国外高考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那他们的成绩如何呢？

某国际教育机构发布的 SAT 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学生整体成绩欠佳。中国学生 SAT 的平均得分仅为 1213 分，与美国学生的 1509 分相比，差距高达 300 分。这 300 分的差距主要来自考查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阅读和写作考试。其中仅阅读一项，中国学生就输掉 170 多分。

对中国学生而言，阅读和写作成为中国考生“重灾区”。SAT 的阅读和写作部分重点考查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中国高中生最缺乏的训练。

中国学生向来以数学好著称，对 ACT 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都能应付自如，但其 SAT 数学考试的平均成绩仅为 547 分(满分 800 分)，只比美国学生高出 30 分。《报告》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学生对数学专业英语词汇总体掌握欠佳；第二，虽然 SAT 数学考试知识面较窄，但是很多知识点考查得更有深度；第三，SAT 数学考试难度相当于中国高一的水平，因此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的优势难以完全展现。

启德广州美国教育中心市场经理陈彩银表示,在 SAT 考试中,中国学生最常选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这 3 门,因为这三门对中国学生来说,较容易拿高分。但是如果有能力的学生,建议挑战美国历史、世界历史这些科目,这样可以让自己有别于众多中国考生的常规选择,如果能考出理想的分数,往往更容易脱颖而出。目前,想申请美国前 50 名左右的学校,绝大部分学校都会要求申请人提供 SATI 考试成绩,如果想申请前 35 名左右的学校,更是要提供 SATII2-3 门的单科考试成绩。

高考万花筒

拜猩猩求高中

日本高考期间,考生的父母都谨言慎行,避免在孩子面前说出“摔倒、跌倒”之类的话;还有很多考生涌入东京动物园的猩猩园,“拜见”那些从来不会从树上掉下来的猩猩,以求自己在高考中不会名落孙山。

凌晨起床补习

在印度的一些大城市里,准备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每天凌晨 3 点就起床,先赶去参加 4 点钟的辅导课,然后还要到学校去应付进度很快的日常课程。此外,家长也对学生施加着很大的压力,不惜投入巨资补习。

偷轿车“S”标志

考前几个星期,韩国全国各地寺庙挤满了前来为子女祈祷的家长们。高考日当天,满眼泪水的家长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将他们送进考场,就如要送他们上战场一样。还有不少家长将写有子女姓名的字条用糖粘在名牌大学的校门上,希望子女能如愿考进名校。

高考前一晚,会有不少胆大或者无望的考生偷走一些韩国现代索纳塔轿车或者三洋卡车上的金属标志牌,这两种车的标志上都有字母“S”,在韩国的高考季节,“S”标志着韩国的顶尖大学——首尔国立大学。(5 月 15 日 新快报 谭嘉颖)

武大原校长刘道玉：高考取消会导致“开后门”成风

“中国大学都一个面孔,都追求大而全,更像百货公司”、“[高考\(微博\)](#)暂时不能取消,取消的直接后果是‘开后门’成风”、“中国教育需要从知识游戏转向思想游戏”……

近日,受邀参加深圳特区报“名家论坛”的[武汉大学\(微博 招生办\)](#)原校长刘道玉接受记者专访。从高考制度改革,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到理想大学的模式,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这位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呐喊一生的老教育家始终侃侃而谈。

犀利的观点，缜密的逻辑，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如果不是他偶尔侧脸重复询问记者的问题，记者常常会忘了身旁是一位年近8旬，右耳失聪的老人。

中国教育应从知识游戏转向思想游戏

“中国教育训练了一批批很会考试的机器人。”刘道玉表示，中国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学习能力却很靠后，这与中国教育的“游戏规则”不无关系。

中式教育“游戏规则”强调知识的传授，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中国孩子每个阶段的教育都伴随着考试，每个人都身经百战。他举例说，中国学生回家后，家长问得最多的是“考试考了多少分”，而美国家长关心的是孩子“今天在课堂上提出了什么特别的问题”。美国的小学生就能独立到图书馆查资料、作文献说明，但中国的大学生都不一定具备这种能力。此外，中国孩子迷信权威、迷信名家、迷信老师，“迷信”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与综合能力。

“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成功的，为什么会出现‘高分低能’？为什么会出现没有后劲？”他认为，知识仅仅是一种对人类过去实践的记录，知识的多寡、成绩优劣与人的能力没有关系，中国教育需要改变“游戏规则”，从知识游戏转向思想游戏。

对此，他提出“思想之光”理论，认为教育应培养学生的“四力”——想象能力、质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

高考取消会导致“开后门”成风

中国教育的重知识轻能力与“一考定终身”的现行高考制度不无关系。近年来，取消高考的声音此起彼伏，近日出现的湖北孝感的“吊瓶班”、东莞的“赤膊班”等事件，再次把矛盾指向高考。“很多人认为高考就是万恶之源，觉得取消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取消了会更乱。”刘道玉认为，高考取消后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免试推荐上大学，免试推荐的结果是“开后门”成风，社会不公成风。

“高考改革关键不是考的问题，而是录取的问题。”他给记者列举了一个他理想的“高考改革路线图”：第一步是独立考试，由国家考试院根据教学大纲独立命题组织考试；第二步是由大学独立录取；第三步是分类考试，组织艺体类、少数民族自治区等不同类别的单独考试。同时，为杜绝不公，取消各类形式的高考加分。

高校非“百货公司”不应追求大而全

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刘道玉曾写过一本书《中国高校之殇》，在书中深刻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总结起来有5大部分：大学理念之惑，大学体制之祸，校长遴选之错，大学学风之浮，教育改革之难。

谈及中国高校存在的问题时，刘道玉眉头紧锁神情忧郁。他特别提出了中国高校的一个怪相：没有特色，个个像开百货公司。他举例说，虽然在办学规模上、办学水平上，不同的学校肯定会有差别，但是它们在体制上、办学模式上没有区别。

“他们都在积极地扩张，追逐万人大学的目标；都在赶时髦，争设所有的热门学科，即使最小的学校都办起了法学院、商学院；都在努力地申办各个阶段的学位授予权，认为只有研究生、博士生阶段的教育才高级体面。”刘道玉说，这是中国高校很失败的一个方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高校既有公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既有超过 10 万人的超大学校，也有只招 6 个学生的“袖珍”学校，既有男校也有女校，每个学校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强项与管理体制。比如，哈佛大学是校长说了算，耶鲁大学是教授说了算，哈佛大学有学派没有思想，耶鲁大学有思想没有学派，没有一所学校是雷同的，这些都是值得中国高校深思与学习的。

理想大学应学术至上立足长远

“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但我不悲观，我相信，历史会前进，未来中国会产生一批理想的大学。”一直对中国教育改革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刘道玉表示，自己正打算写一本《理想大学》的书。

任何一所理想大学都是个性化的。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的基石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和创造不止。“大学教师一定要视学术为生命，像出家人那样用一生去追求，不考虑评奖、职称，放弃功名利禄，我们需要这样的教师，也需要这样大学。”刘道玉很认同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福斯特在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一所大学，既要往前看，也要往后看，唯一不能只看眼前。”他说，向后看才能知道历史，以史为鉴；往前看，是因为一所精英大学应当着眼未来，唯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陈景润在今天肯定会被解聘，因为他不发表论文，也没有成果，在证明出哥德巴赫猜想之前，早就得下岗了。”他认为，一所大学不能定位于为国家和经济利益服务，因为国家利益有当前和长远之分，很多大学因为眼前利益阻碍了视野，而不愿去追逐更长远的利益，这对大学的长远发展，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悲剧。（5月28日 深圳特区报）

“拼房招生”严重损害教育公平

想上镇里公办幼儿园？“80平方米以上住房，一平方米都不能少”是硬指标。近日广东佛山一所公办幼儿园招生，市民遭遇“拼房”门槛。幼儿园和当地教育部门称：此举是“优先保障可以买得起80平方米住房的外来工需求”，拼房招生是给外来工“平等机会”。（2012

年 5 月 25 日《京华时报》)

在旷日持久的教育公平与否争论中，佛山市一所公办幼儿园一纸“外地生入园须有 80 m² 住房”的规定，不仅让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重新显露，更加深了外来务工子女入学难的困难，破坏了教育公平的本质。

事实上，此次佛山市幼儿园的“另类”政策，只是近年来教育资源不公平的一个缩影，在教育资源日益稀缺、外来人员不断增多的今天，如果不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打破户籍桎梏，诸如此类“拼房招生”政策或许还会愈演愈烈。

无论“80 平方米以上住房”的门槛限制，还是之前备受诟病的“借读费”，都足以证明，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最大困境不在学费上，而在“身份”上。因为没有本地的户口，就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不知道此次这所幼儿园所设置的 80 平方米的标准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肯定的是，这样的苛刻的规则必定会造成大批的儿童无处求学。

对于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佛山来讲，80 平方米的住房其价格也接近百万。而对于那些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住房，简直是天方夜谭。在佛山的一个小镇，尚且如此霸道，而对于那些北上广深地区，外来子女入学或许更加困难？

目前，全国已有 2.6 亿流动人口，其背后是 5800 万留守儿童和 2700 万随迁子女。如何保障这数千万的子女入学，不仅合乎义务教育的原则，更能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对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方面尚未完全转型的佛山市，如果任由这种教育与住房绑定的政策大行其道，不仅可能不会吸引“人口红利”，减少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更会加剧经济上的松动，从而影响到整个的经济发展。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讲，政府固然要充分整合教育资源，加大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要将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打破藩篱障碍等政策。但仅凭这些并不能够改变教育资源“僧多粥少”的困境。从近年来看，从户口靠挂厕所到各地学区房暴涨，都足以说明，影响教育资源的不仅仅是稀缺，而是一种招录不公。

况且，目前教育资源所面临的分布不均、资源稀缺等在短时期内无法完全被调整，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最为关键的还是要打破户籍制度，让每个人都获取平等的教育资源。而此前，山东省正在研究出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能否打破地市户籍限制，不仅是该政策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而是各地积极探索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借鉴。

(金羊网 2012-05-25)

“80 平方米”的门槛挫伤了教育公平

近日，广东佛山一所公办幼儿园招生，规定外来人口拥有住房面积不少于 80 平方米 家庭的幼儿方可入园。当地教育部门称，此举是“优先保障可以买得起 80 平方米住房的外来工需求”，并称给了外来工公平的机会。据了解，该幼儿园的做法属于试点，或将在全镇 83 家幼儿园推广。(5 月 24 日《新京报》)

据幼儿园回应，这一做法并非无根无据，在 2008 年出台的《佛山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政策性借读生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中就规定，“外来人员享受免费义务教育须购置商品住宅建筑面积不低于 80 平方米”。问题是，在当下的中国，学前教育并未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在这一块，不仅有公办幼儿园，还有私立幼儿园，由于缺乏政策指导，使得学前教育高度市场化，竞争非常激烈，一些幼儿园的收费甚至比大学还贵。

拿义务教育政策来作为学前教育的入学门槛，明显有偷梁换柱之嫌，更何况，这一规定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接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孩子的权利和教育部门必须履行的职责，如果仅仅将父母身份、财产多寡作为他们入学的准入证，明显是对他们合法权益的剥夺。政策不该如此歧视外来务工者及其子女。遗憾的是，在户籍政策改革还未有明显突破的当下，似乎许多地方对这些孩子作出了类似的规定，着实“坑爹”。

改革开放 30 多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谋求生计，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一直以来，城市却难以接纳这部分人群，歧视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就拿子女的教育问题来说，他们有两个选择：让孩子留守或进城，但二者都不是好选择。“留守”造成孩子长期与父母不能一起生活，成长过程中心理问题不可避免，此外，也担心遭遇意外情况。日前，江西一农村，五个儿童溺水而找不到年轻人施救就是明证。反过来，如果进城，城市却没有做好对他们的接纳工作，设置过多的门槛导致他们不能享有同户籍儿童平等的权利。

当然，有人会说，设置门槛是因为教育资源的稀缺。这话不假。据悉，这家幼儿园所在镇的镇教育局督导组回应说，作为镇属幼儿园，首要任务是保障户籍人口就读。幼儿园每年招生 100 人，光是户籍人口都满足不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分享教育资源，户籍人群会本能地抵触。说起来，这并不是他们自私，而是在教育资源的争夺上，不得不冷血，你不争，结果只能是自己的孩子没地方上学。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

今年两会已经明确：中央财政安排教育支出 3781.32 亿元，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支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接受义务教育，安排资金 82 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 4% 以上。事实上，当下不仅是义务教育需要财政做到公平公正，在学前教育阶段，同样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打上被歧视的烙印。

此外，在扩增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应该打破留守儿童随父母进城的门槛。没有 80 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孩子就不能入学，如此之高的门槛，务工人员怎堪承受？！这么明显的歧视政策本就不该存在，更不该试点推广。我们期盼更加公平的教育政策的出台，一个对孩子的未来都不能公平对待的社会，我们怎敢寄予更多期盼！（5 月 25 日曹伟 长沙晚报）

积分入学彰显教育公平

5 月 26 日《梅州日报》报道，从今年开始梅江区试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申请入读小学起始年级积分制。按照公安户籍部门统计数据计算，今年梅江区有 1300 个名额可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

积分入学，即外来务工人员只要是真正为输入地城市做出了积极贡献，积分按计分方案达到一定分数，名次靠前，就能得到城市的优秀教育资源。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这无疑是在教育公平方面又迈进了一步。对输入地梅江区来说，积分入学制会刺激更多外来务工人员增强职业稳定性，提升工作荣誉感、使命感和精神归宿感，将输入地当做“第二故乡”，和输入地进行真诚的精神和经济互动，创造互惠双赢的格局：城市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而得到持续发展，外来务工人员因为输入地的真诚反哺，而得到精神愉悦以及市民身份认同。

当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是个大问题，想要一下子解决，也不现实，因为教育发展和均衡需要循序渐进慢慢来。但是，只要政府真正将这个问题当做了重要问题，通过具体措施努力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就能够感受到这份公共关怀和公共深情。就像“积分入学制”，操作细则看得见、摸得着，简单易懂好操作，外来务工人员觉得可信，就能提高工作士气，激活公平信仰，“大家都不去找关系，按照条件来定夺，比如积分申请表中有一项是‘在区签订劳动合同年限’，你在梅江区劳动时间较长、贡献较大，所以你积分较高，孩子优先安排就读，这是非常公平的事情。”群众是公共政策最好的体温表，仅仅从这一点看，这就很值得嘉许！

由此想到近年来各地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改革的种种表现。比如我国一些地方实施的“异地高考”，外来务工人员子弟能够高考的学校却仅仅限定在“高职高专”范围，且操作条款不够透明，可操作性不强，更有的地方迟迟不肯表态，凡此种种，根源还是不够重视，不愿让外来务工人员分享改革成果。实际上，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却不能平等享受社会福利和各种社会公共品，与他们做出的经济贡献形成了一种巨大反差和事实不

公平，这是不应该的，也是缺乏长远目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积分入学制”体现的这种务实开放、以人为本的精神，真值得各地广泛学习。（2012-05-28 梅州日报）

优化网点布局 构建“大均衡”教育

今年，南昌市教育局颁布实施《南昌市中心城区中小学（幼儿园）网点布局规划》，加快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网点建设，调整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着力推动全市教育优质化、均衡化发展，在“增”、“扩”、“联”三个字上做足文章，构建“大均衡”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市教育局与各县区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指导南昌县、新建县、安义县、进贤县、湾里区全面完成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布局调整规划编制工作，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今年，全市 35 所义务教育学校网点将开工建设。市教育局还以省级教育园区建设为平台，建设一批布局合理、建设规范、设施齐全的新型学校，推动园区内的学校现代化、优质化成长，做大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市教育局以“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将在城区新增 12 个班级以上规模的公办幼儿园 16 所，同时，加快推进乡镇中心公办幼儿园建设，提高优质幼儿园覆盖率，每个乡镇都要有一所中心幼儿园。农村孩子不进城也能上公办幼儿园。

当“有学上”的基本要求满足后，群众对“好上学、上好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表现得日益强烈。而现实问题是，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不仅是总量上不足，分布上也不均。今年，我市将完成南昌一中、十九中等新建工程和部分高中搬迁工作，做好五个中心城区优质高中新校区建设的前期工作。市教育局在统筹全局、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大胆决策，紧贴城市建设步伐，决定把老城区相对集中的部分优质高中逐步调整到其它相对不足的城区，而腾出来的校区用来办更多的优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例如，南昌十九中高中部搬迁红角洲后，将使红谷滩新区新增 3000 个优质高中学位，叠山路老校区也将扩大初中招生规模，三年将新增学位在 600 个以上。南昌三中高中部搬迁至位于青山湖大道的原南昌师专校址后，校园面积扩大了三倍，在原来 40 个班的办学规模基础上，可增加 20 个班 1000 多个优质高中学位，将扩大城东优质高中资源，因为交通便利，也不影响老城区学生前往就读。而原南昌三中高中部校址分三年逐步移交给东湖区南昌育新学校举办优质义务阶段教育，今年就将增加 600 多个优质教育学位，三年后将增加 1800 余个学位。

探索办学思路，创新工作举措，采取兼并、联办、委托管理、集团化办学等形式，发挥优质学校辐射和带动效应，实现优质资源配置最大化。市教育局鼓励全市有实力的优质学校实行集团化办学，充分发挥其品牌效应、资源优势和辐射功能。将试点组建若干个教育集团，谋划组建“行业型”职业教育集团，做大做强优质职业学校。对于不具备条件整合的初中教育资源，将打破部门、学校壁垒，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推行学区化管理试点，促进优质资源学区内再提升、再改造、再扩充。(南昌日报 骆辉)

教育公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

近日，山东新华电脑学院招生负责人指出，教育公平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年年都有人提，但总是得不到妥善的解决，这与国家调控政策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各地区发展水平的制约影响严重。

一项权威调查研究成果显示，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阶层差距在近年来愈发凸显，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主要、最显著的教育差距。在这样“不公平”的教育环境下，重点大学还是成才的唯一出路吗？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也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大学对于一些学生来说确实是进行深造的好地方，可对于那些不适合大学的学生们来说，勉强进入大学只是一种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的行为，那么这样的学生想要寻找成才的出路，该何去何从呢？山东新华电脑学院老师表示，尊重规律，合理规划，选择一项自己喜欢并愿意为之奋斗的行业或职业进行专业技能学习也不失为一种让自己成才的方法。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教育质量的提高，需要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当各类、各级教育实现协调发展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们期望中的高质量教育。山东新华电脑学院以学生教育均衡化为追求目标，关注教育的公平、均衡和普及，承认学生个性和天赋的差异，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让每一位新华学子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学习深造，并成为期望中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山东新华电脑学院隶属于著名的新华教育集团。始建于1988年，是国家信息化教育全国示范基地、中国电脑教育十大影响力品牌院校，主要从事艺术设计、软件开发、网站开发、环境艺术、影视动漫等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教育。20多年来，新华为社会培养了60多万名优秀人才，就业率在业内始终保持领先水平。完善的就业保障，全方位的就业服务，使广大新华学子不仅能成功就业，更能成就事业。学院定期对已就业学生进行回访，了解其工作情况，

同时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同时，各地“校友会”的成立，更方便了毕业学子与母校以及校友之间的交流，联系，为学子工作、创业提供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2012-05-28 人民网-山东频道记者 何亚娟)

樊城区斥资 1.3 亿元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近年来，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樊城区通过改造薄弱学校、加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建设、集团化办学、均衡师资力量等方式使全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水平，樊城区拿出 1.3 亿元重点用于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等方面。据了解，该区将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采取撤、并、留等调整措施，成立十二个教育集团，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并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使区域内学校建设统一布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质量标准、统一装备水平。建立学校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保障和改善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坚持推行成长成才教育，形成具有特色的“成人教育”地方教材，并推行课堂改革，逐步实现区域内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一体化。(襄阳汉江传媒网 通讯员冯玉娟 付晓方 记者 刘德祥)

● 国是论衡

罗崇敏：价值主义教育要使教育回归本真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罗崇敏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罗崇敏说，价值主义教育思想最根本的是使教育回归本真，也就是使人类的教育回归本真，要使教育真正成为发展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实现人的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回归这样一个本真，也就是我们的教育都是为了人，教育过程是人、教育的结果也是人、教育的目的更是人，这就和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思想把人异化为物不同。

到底教育目的价值在哪？罗崇敏认为，教育就是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有能力的人，使人成为幸福的人。如果教育不能使人幸福，教育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提出价值主义教育就是要使教育回归人的本真，使教育去发展、实现人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主义教育思想根本是使教育者教育唯真、唯智、唯实、唯和。所谓“唯真”就是教育要崇尚真理、追求真理、实践真理、捍卫真理，做真人、行真事，要真爱、真诚。这就对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教育培养人的两面性产生了挑战。现在的教育往往培养人的一种政治表达，就是表达如何去追求什么，

表达如何忠心，表达如何为了未来的目标。另外，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热爱智慧，敬畏智慧，生长智慧，要求取智慧。这样，教育就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造，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爱智慧的民族，使每个人成为爱智慧的人。然后去增长自己的智慧，实践自己的智慧。2012年05月23日 [中国教育报](#)

内容摘要：国家领导人不时出现在田间地头，彰显了中国政治运转的反官僚基因。不过，这条“延安道路”的打造，如今已是不同一般的缜密。

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只要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不可战胜。执政63年间，中共领导人不时地走出机关的深宅大院，到群众中去。

这条绵延不绝的群众路线，不仅定格了中共去认知世界的方式，也不时揭示了政权的本来源头。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次出行去收集意见，从选点、程序、安保、接待，都需反复推敲，层层审定。

调研点的反复敲定

2004年春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浙江嘉兴调研时，他深有感触地对当地官员说：“我来浙江工作1年多时间，到今天已经把全省11个市和90个县（市、区）都跑遍了，其中有些市县去了多次。”

习此前有一个观点广为人知：当县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但从省部级官员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政治局常委，遇到的问题不再局限于一省一市范围，心中关注点也更为宏观博大。领导人除了每天翻阅大量地方上报的信息材料外，有时仍需要亲身下去摸底调研。

如今，主题调研越来越成为中共高层搜集掌握下面信息的方式。这种调研主要分三个大的方面：一是针对已出台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二是了解各自分管领域的情况；三是因应重大突发公共性事件和自然灾害。

有接近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士透露，领导人确定调研主题后，具体基层调研点一般由中办或国办联系选定，也可以领导人自选，如在选择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联系点时，习近平就选择了他熟悉的浙江嘉善。

在选择基层调研点时，典型性是其考虑的一个重点。“比如农民工问题，首先会想到农民工输出大省江西、河南等省，然后省里再选择一个典型的市或者县，再往下一层层选，并结合当时的热点话题……这样上下不断协调沟通，最终确定调研方案。”

如果是中共中央九常委集体调研，则需要内部协商、集体统筹。包括地理上东西南北中，

全国都覆盖；经济发展上东中西梯次明显。领导人所调研的基层县市，人口规模往往在 30 万~40 万之间，政情单一，相对符合“解剖麻雀”的调查原理。

从具体的点来看，如“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中，胡锦涛联系点陕西省安塞所在的延安地区，在中共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吴邦国联系的广西百色，是邓小平领导起义的地方，革命老区要科学发展；温家宝联系的四川江油，是灾区震后重建的代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一直走在改革前沿的广东、经济大省山东、京畿重地河北等，每一处的选择似乎都有其深意。

接近中办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中央领导人行前都有一些要求，但因为调研时间太短，“可能去一个地儿就一两个小时，你说要全方位全了解不太可能”，所以在调研之前，常常由相关部委负责人或被调研省份的书记一把手亲自完成决策辅助性信息。

由此，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联系点，往往成为省委领导的联系点。如胡锦涛调研安塞、李克强调研山东桓台、李长春调研广东增城市之前，陕西、山东和广东省委书记赵乐际、姜异康和汪洋事先都前往联系点调研摸底，情况摸准后，再把信息反馈给中央。

调研安排异常严密

上述人士称，领导人出行调研通常都有自己要关注的东西，工作人员做好包括调研时间、调研地点等方面的方案后，再由领导定夺。调研内容有一个系列的提纲，主要是最近热门的话题，包括领导本人关注、部委提供、专家建议及国外消息四个来源。

按目前领导人基层调研的行事规则，中央领导下基层调研，事先拟制的调研行程方案为绝密等级，不为普通官员和民众所知，只是在中央领导人集中调研某地后，才会通过官方喉舌以新闻通稿的形式统一发布。有时被调研县市的某一点，直到领导人到来前，普通民众才会被匆匆告知。

2006 年春节，胡锦涛到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与村民一起过春节，并到康海发家包饺子、吃年夜饭。那天，当康海发看到胡锦涛在一群人陪同下，往自家走来时，他竟激动得慌了神。“提前一个礼拜，只听说是有个中央领导要来，也不知道是谁，没想到是总书记。下去跟总书记握手后，我都不知道他的警卫怎么把我架上来的。”但紧张的情绪很快便被化解，“他特别亲切，拿我们陕西土话来说，特别喜乐。有时候一个县委书记还有点官架子，但他一说一笑，让人很放松。”康海发回忆。

看上去气氛甚为宽松的调研活动，其实事先安排异常严密，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领导人调研行程安排显示，这份名为《中央领导人某地调研活动接待方案》中，两天的调研时间里，领导人一步一动的安排精确到以分计，如上面写到，领导人第一天上午时间“约需 2 小时 25

分钟”，下午调研时间“约需 1 小时 40 分钟”。第二天上午调研时间同样“约需 2 小时 25 分钟”，下午则安排为在当地宾馆召开座谈会。

“接待方案”分地点、主题和活动内容及方式三部分。调研地点圈定了当地需考察的三个村子，调研主题分别为：该村近年来发展变化情况、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及产业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科学发展问计于民等。

该份方案来看，虽为呈送给领导人的“建议书”，但显然经由被调研地的省市领导反复酌定。领导人调研考察的村庄内容、具体农户、谈话内容和方向，事先都已安排妥当，

“到新建的新村看一户农户（贺某某）新房建设情况，主要了解家庭收入情况、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情况、市、县扶持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及有关惠农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到旧村改造户（宋某某）家里了解生活情况，之后到院内与围来的村民（约安排 10~15 名，主要是村支部书记、产业大户等群众代表）促膝交谈，重点安排 3~5 名群众发言。”

安排好具体群众后，省市接待方案还要帮领导人设定几个谈话主题，预设过程之细微，令人惊讶。如：了解农民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农业农村应如何科学发展、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关于“三农”政策的意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在某个村庄、工矿企业或机关单位，领导人停留多少时间，方案上都分别建议了 15~20 分钟左右的时间。

胡锦涛到安塞调研时，与沿河湾镇方塔村党支部书记白光荣聊了足足 30 分钟。但白光荣回忆，在他汇报期间，不断有人在后面拽他的衣服。“本来可能规定不超过 20 分钟，但他（总书记）问题太多了。”

不过接近中办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领导调研的时间，分计划内和计划外，时间富余时，就会有计划外的调研，这个领导人自己会有要求。

安保措施重重

某省警卫部门有关人士称，领导人出访前，其调研接待方案层层设防，秘密等级高；而省市接待方案中预先安排的领导人访问对象，也需要政历清白，安全可靠，当地县市组织、公安部门事先需慎重把关。

柴金甫是浙江嘉善县的花卉种植大户，在大云镇缪家村承包土地种养花卉，柴金甫曾参加了习近平当年到嘉善的调研活动。柴回忆说，中央领导到嘉善前，当地组织部已经找他谈话，“组织部当时跟我说，不用紧张，领导问什么问题，你回答什么”，那天习近平到嘉善县城后，柴金甫放下手头的活，提前去了村民缪新兴家。缪新兴家是当地政府设立的一个农民

远程教育点，“那天刚好是远程教育点的学习。”

柴金甫如约见到习近平，在嘉善县、大云镇领导发言结束后，柴被人介绍给习近平，习态度和蔼地问他对于农民土地承包政策怎么看待等几个问题，柴金甫都轻松回答。在缪新兴家，习与村民们聊了有五六分钟。不过柴金甫发现，屋里人很多，但柴认识，大多是村干部，或像他这样事先安排好的群众，“倒是后来外面有些围观的人群，都是一般村民和路过的。”

严格意义上说，柴金甫也不算普通群众，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浙江省的人大代表。这次来访的中央领导人习近平原来是浙江省委书记，作为人大代表，他一点都不陌生。对于此种调研的“被安排”，柴金甫觉得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是国家副主席，领导人来了，不可能乱七八糟的人都进去，总归有个安全问题。”

2006年胡锦涛到安塞过春节前，当地也做了周密部署。“踩点踩了很多家，谁知道定在哪一家？”康海发说。有村民猜测，最终定在康海发家，可能是出于安保考虑。“他们家的位置，在全村最高。”

对被调研地省市来说，中央领导在当地起息出行，是一件大事。当地安全部门旋即进入一级警备状态，社区、街道也被要求，日常维稳工作中发现的受过处理、对政府不满等方面的人士被排斥在领导视线以外。

江油市方水乡白玉村的党委书记邓怀才被安排全程陪同温家宝在白玉村调研。此前，省里、市里的领导来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县里的一天来几次，乡里的就直接蹲点，一级抓一级，压力很大，只能做好，不能做差了。”除了要带领导去看各个安排的点，确认达到迎检要求，邓怀才还被要求不断重复要给温家宝汇报的内容，不过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我见过几次领导人，哪个听你念稿子嘛，都是像拉家常一样，摆谈一下。就算开座谈会，也不会让你念稿子。”

2008年，李克强副总理到他的工作联系点山东桓台调研。当地媒体在调研结束后报道称，李克强此次视察山东桓台，是多年来中央常委领导同志首次视察。桓台上下非常重视，调集了大量的警力做好安保工作，并大力做好环保和卫生工作。

桓台县城所在的武警山东淄博支队桓台大队的一则简报称，先后开展了“秋风一号”、“秋风二号”和“秋风三号”三次专项（集中统一）行动，重点加强了对社会面的治安控制、治安隐患的安全排查、重点人员的稳控、基础信息的搜集和各项警卫方案的制定，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确保了警卫任务的万无一失，确保了首长活动的绝对安全。

吉林乾安则字村是中央领导人当年工作联系点调研的村子之一，村民张志彪对一个细节记忆深刻，“领导人一来，派出所和乡上把村里的所有道都封上了，村里老百姓上道看医生也

不行。”领导人走后，村道才解禁。

张志彪更向记者透露一个惊人的“事实”：贾庆林主席来他们村调研时，村支书和乡镇官员为应付调研，雇用村民从邻村端子村借来 73 头牛充数，领导走后一个月，又把牛送回。“具体谁借的牛，谁还的，我都知道。”张吉彪说，他公开反映此事好几年了，但没人理他这个茬。

高层越过多个层级进行基层调研，本意在规避科层制对信息格式化处理所带来的失真。但一些过度的安保，又带来了新的失真。

领导人的“自选动作”

前述接近国办的人士透露，一般情况下，领导人调研是希望看到一些问题，了解一些做法，以期据此对面上有个大致了解，对全国其他地方有指导意义。“一般是哪些地方某一方面做得好的他会关注，他不了解的，就得有部委提出意见，建议之后领导制定具体的时间就去。”

“当前政绩考核体制下，可以想象的是，看问题虽是领导初衷，但这在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该人士称，相信没有哪个领导人下去调研不希望知道真实情况，但在各种利益驱动和风险担忧下，下面部分官员难免出现瞒报。

曾陪同朱镕基调研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回忆，即便是朱镕基，也曾被骗过。“朱镕基是最厉害的，我陪他出去过，人家骗不了的。人家汇报的数字对不上，他马上就把人一阵责骂。问信贷，你怎么吸收存款，怎么贷款，为什么贷给这人那么多，前因后果说不清楚就把人训一顿，那干部吓得直哆嗦。

但是有一次朱镕基也受骗了。到山西去查集市贸易，完全是假的，给他看了，他回来以后，里头有个人给他告状，他马上派他秘书去看，那个集市已经没了。他大发火啊！”张卓元担忧，这么聪明的人都被骗，“那这种情况调查到的东西，能作为一个将来经济发展思路的背景材料吗？”

2010 年五四运动 91 周年时，温家宝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交流，校方特别安排学生会主席与温家宝互动。不料，温家宝当场揭穿：“我知道你们是安排好的”，并批评校方“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

“家宝同志每年都要深入农村搞调研，是经常的事。他搞调研有一个特点：每次下乡不是按照地方政府或是党委给他安排好的路线去考察，而是随时改变路线，或随时让车中途停下来。这样的好处就是能真实地了解到农民的情况，把地方政府的人搞得措手不及。”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在接受媒体采访透露，中央领导到农村考察，有时要了解真实情况也不容易。例如看到粮食堆积如山，却可能是从别的粮库临时调来的。”

张虎林说，温家宝对这类情况心知肚明。所以他才常有“惊人之举”。一个周知的例子是2003年底，温家宝在重庆考察时路过云阳县一个小村庄，也是中途下车，问一位叫熊德明的农妇，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熊德明说到在外打工的丈夫2300元工资被拖欠，给家中造成困难。之后，熊德明被拖欠的工资很快被追回。

“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对中共调研时弊，习近平去年底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要求，“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

平均每月一次

领导人基层调研的频率有多高？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统计，2002年10月到2007年9月的五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到全国各地调研考察累计达352次，人均39次；其中，温家宝调研次数最多，高达76次；其次是胡锦涛，达48次。而在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共计不足四年的时间里，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位领导人在国内考察调研次数共达到386次，人均43次，其中温家宝调研次数达到了创纪录的84次，平均不到16天就外出进行一次考察调研；胡锦涛、贾庆林、李长春和习近平的考察调研总次数也达到40次以上，基本做到了平均每月外出做一次考察或调研。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统计还显示，在第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成为调研主题频率最高的是“五年规划执行与预研”、“践行科学发展观”，分别有95次和105次。

领导人多数调研是错开时间，且以分管系统的需要进行主题自我设定。但在2005年1月到2006年6月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中央九常委第一次集体亲自联系挂点示范。这一联系点制度在2008年9月开始，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再次发挥作用。

2008年、2009年，为应对拍岸而来的金融危机，领导人集体调研的频次增高。2008年7月3日至8日的5天内，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分别出现在江苏、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5个外贸型省份。之后，4万亿元的中央刺激经济方案出台。第二年，为宣传解释中央的刺激方案以及搜集反馈信息，4月和6月，九常委先后两次对近20个省市进行调研。

2010年起，中央领导人的调研频次开始稍有回落。

调研之后互动频频

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日常政务繁忙，即使是曾经熟悉的某一位师长、故交，想要联系本人也是一件困难的事。但领导人还会通过书信往来等方式了解调研点的发展变化。

“或许今年这段时间会收到习副主席的来信呢！”2012年3月21日，年已60的姜银祥再次产生美好的期盼。姜银祥此前是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的党支部书记，下姜村是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的工作联系点，习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先后去下姜村调研7次，“4次直接到我们村里，3次是我到镇里直接向他汇报。”

习近平以后辗转上海、北京任职，与下姜村的联系仍不断。“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是每年一封信。”姜银祥说，2009年春节前，已去北京任职的习近平主动给下姜村来信，询问村里的发展情况，并祝乡亲们春节快乐。

2010年农历正月二十，他以下姜村党支部名义给习近平写信，汇报这几年来他的工作联系点的发展变化情况，姜是用快件寄过去的，信上收件人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习近平书记”。2011年5月，浙江省委办公厅收转了习近平给下姜村的回信，习近平在信里勉励村民继续努力，抓好生产，共同致富。

2009年8月，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作登瑶族乡陇穷小学六年级学生张玉玲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函信纸，看着上面竖排的毛笔手写体，很久之后才相信这是吴邦国委员长给她写来的亲笔信。

当地媒体报道称，“张玉玲站在学校的小操场上，给聚拢来的乡亲们朗读了这封信。当听到信中‘希望老区人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老区孩子个个都有出息’的祝愿时，许多村民激动得直抹眼泪。”

张玉玲清楚地记得，吴爷爷2008年来的时候问她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还关心地问：“一个人回家怕不怕，有没有父母来接？”合影时，张玉玲就站在吴爷爷的左边。

在学校校长的帮助和指导下，这位瑶寨小女孩平生第一次给中央首长写信，因为紧张，她甚至没在信上写上落款时间。张玉玲后来成为田东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的少代会。

山东桓台邢家镇黄家村的村民崔佃玉、张爱莲夫妇在李克强总理走之后，也拿起笔，小心翼翼地给北京写信，内容大致为，李副总理曾经到访的村庄，半年之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喜悦之余，代表村民给总理写了封信。

不久之后，他们就收到回信。在信中，“他不仅为俺村发生的新变化由衷高兴，还向俺们全家和乡亲们问好，祝愿俺们来年有个好收成，生活再上一层楼。”崔佃玉说，李克强副总理在信中还说，要把更多的实惠给予农民，让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崔佃玉夫妇现今还保留着珍贵的“总理回信”复制件，并决定把它作为传家宝，子孙世

代保留下去。而信的原件，经山东省委、淄博市和桓台县的各级领导层层批示学习，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件，被政府归档保存。（2012年05月16日凤凰周刊 李光敏 钟坚）

●人物春秋

揭秘 301 医院

301 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简称。

在很多国人眼里，301 医院是一个既神秘又威严的地方。不仅因为其医术高超、医疗设备先进，而且它还是众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医的地方。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黄克诚、王震等都先后在 301 医院接受手术和治疗。

301 医院的建立

时间定格在 1954 年。刚从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回来的洪学智将军被黄克诚将军找去谈话，并中断了其在军事学院的学习，出任国家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洪学智将军不忍放弃在南京的军事学习，向黄克诚将军提出异议，黄克诚将军说：“现在总后的工作很多，有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头绪复杂，机构要调整，许多标准制度要制定，所以军委才决定你不要脱产学习了，马上回来工作。”洪学智副部长中断学习，开始了总后各个机构的整顿工作，其中对医院整顿最大的事件就是成立了解放军 301 医院。

解放军 301 医院的成立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需要。

在 50 年代的中国，最有名气的医院当属北京协和医院，专家汇集，医疗技术高超，医疗设备先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很多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汇集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他们看病和住院的首选。但当时，协和医院属于军队所管。过多外国人的涌入，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周恩来总理在某天就找到了洪学智副部长，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协和医院归军队管，外国人又常去看病，有的还要住院，军人管外国人总是不太方便。看来，协和医院归国家卫生部门管可能更好一些。”洪学智副部长也认为这样不利于中国的保密工作。所以，周总理指示协和医院划归国家卫生部门，再成立一所归军队管的医疗水平比较高的医院。由此 301 医院的筹建提上日程。

301 原是华北军区一所学校的代号，后来这所学校改为医院。规模小、设备落后，技术力量也比较薄弱。中央决定以 301 医院为基础，充实力量，增加设备，扩大规模，组建解放

军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在筹建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这其中最主要也最突出的就是人才问题。最初决定从协和医院抽调人才，可在那个连初中生也是宝贝的年代，协和医院自然是不同意，80名在协和医院进修的全军医生，最后抽调过来的只有一半，301医院要人，协和医院不放人，人才问题成为301医院成立之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两方矛盾日趋白热化之时，洪学智将军从大局出发，说：“不要争了，协和不放人也是爱才心切，不论在协和还是在301都是咱们国家的医院。再说协和医院经常接待外国人看病，理应有更强的技术力量，那也是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水平和形象。我们缺人才，可以到四所军医大学去抽调，以后还可以慢慢培养。”洪将军这番肺腑之言说完，301医院也就放弃了与协和医院在人才问题方面的纠缠。真可谓“退一步风平浪静，忍一时海阔天空”。协和医院见301医院让步，主动提出将自己护士学院的一个副院长抽调过来，帮助全军筹办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经历过最初的艰难期，承蒙国家领导人的关心，301医院在人才培养和医院建设上慢慢步入正轨。

1957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但是，很多人还是习惯称之为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是全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是国家重要保健基地之一，负责中央、军委和总部的医疗保健工作，承担全军各军区、军兵种疑难病的诊治，医院同时也收治来自全国的地方病人。

301医院南楼

301医院南边有座楼，从外表看来，和其它内外科的病房楼没有多大的差别。可是这里却是整个医院防卫最严密的地方，没有出入证不允许进入。晚上，整座楼灯火辉煌，门口两侧的警卫放出十几米远，周围还有三人一组的流动哨。这里就是中央领导人接受治疗和保健的地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楼。这里曾经住过很多共和国优秀的领导人，当权力的外衣脱下，当病痛像光临普通人一样光临我们敬佩的老首长时，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的？这座神秘又普通的大楼，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所有的一切。



图解：邓小平、卓琳与李炎唐医生

邓小平：无非第四次被打倒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果没有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中国或许没有现在的日新月异。

小平同志在 1976 年末的一个暖冬住进了 301 医院。那天，邓小平穿着后来我们经常看电视上见到的中式棉袄，眉宇间尽管隐含着丝丝痛苦，但精神依然矍铄，政治家的硬气和傲骨跃然在他的举止之间。据为他手术和治疗的 301 医院著名的医生李炎唐回忆，邓小平同大家见面非常和蔼，家属和工作人员也十分和气。经过检查，邓小平同志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可是考虑小平同志的年纪和身体状况，大家都捏一把汗，小平同志用浓重的川音说了一句“没事！”和家属对医生做出决定的赞同让所有医务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开始立即着手准备手术事宜。

为了保密和方便进行手术，邓小平同志当时住在南楼的五楼，整个一层只有他自己住。南楼走廊很长很宽敞，空间很大也很方便，安全方面也有条件。中间走廊有一道门，是工作间、会议室、活动室、会诊医生办公室，到里面病房走廊还有一个门。单元房是高级首长用的，还有专用的电梯。

住宿和安全问题安排好以后，就开始对小平同志进行术前的检查和护理。邓小平同志一直很配合，也很有忍耐性。给首长做手术必须要将情况报告上级，这是国家的规定。1976 年 12 月 16 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汪东兴亲自批准给小平做手术。手术由李炎唐主刀，周柏铭担任第一助手，普外科的陆惟善做第二助手。吴阶平院长和许殿乙主任在手术台下指导，心电图监护由曾诚富主任和赵毅刚负责，麻醉由靳冰和宋运琴负责，分工明确，只为确保万无一失。手术静心准备，消毒措施也是细心周全，和普通人做手术一样，小平同志的手术也让家属签字。医院上下严格保密，知道邓小平要做手术的只有参与手术和护理的人。邓小平同志在手术前对医生说：“我，相信你们医院，相信你会尽最大努力来治病，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并严禁夫人卓琳询问医生术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说的这番话宽慰了医生的心，使医生放下了心理包袱，他是一个理智的人，并且深谙心理学。作为高级领导，任何一个人医护人员都不会对其马虎，他说这些话让所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得到了放松。

手术进行的非常顺利，大家配合的很默契，出血很少，没有对小平同志进行输血。随着主刀一声“好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邓小平同志不愿全麻也不想睡觉，手术一半，问他需不需要用点药睡觉，邓小平同志说：“不要紧！我不用药，没事。”这样的一句话，让所

有在场人员肃然起敬，其实只要手术，患者都会难受，都会紧张，但邓小平的这句话让所有人觉得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意志确实不一样，做手术都这么镇定，甚至吭都不吭一声。

手术后回到病房，他只能坐着或者躺着，很难受，可是他一片止痛药也没吃，一针止痛针也没打。几天后，首长便活动自如，进食良好，恢复的非常快。在恢复期间，首长有两件事让所有人被他的自律和自强精神所折服。一件是关于戒烟的。因为手术期间不能抽烟，医生就问首长行不行，首长说行。医生说：“首长！别人说戒烟是不是要吃点糖呀，要不控制不住呀？”首长回答到：“不用，那是自己糊弄自己，戒烟还吃什么糖？主要还是不想戒。”首长说不抽就不抽，从手术前几天到出院，一支烟都没有抽。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自律精神可见不一般。

另外一件是手术后第三天，首长要起床，要自己站起来。按照规定，术后第三天是不允许起床的，但首长在体内还有两根导管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自己站起来，并说：“不用你们扶，我自己会。”说完就坐在床边，一下子就起来了。术后第三天自己顽强起床，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场的医护人员都为首长创造的奇迹鼓掌。三次被打倒却依然站起来的首长确实令所有人敬佩。

手术后三个礼拜不到，首长就接到要去开会的通知，而且必须是一个人去。当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国家的工农业发展比较滞后，受迫害的同志也没有得到解放，人心不稳，人心思进，希望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已经是大势所趋。小平开完会回到医院非常高兴，当有医生开玩笑的问到：“首长以后你出来怎么领导我们干啊？”小平同志斩钉截铁的说：“我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几十年革命历练和政治迫害后依然站起来道德人所拥有的坦荡胸怀。

1977年春节过后，首长便出院了。1977年7月，正式复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开始全面领导新时期的建设与发展。

20年后，我们伟大的设计师，令人尊敬的首长再次住进了301医院，还是在南楼，而这一次，他却再也没有站起来。



叶剑英元帅与邓小平主席

叶剑英：雄姿与祖国山河同在

叶剑英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军事家、第一二代党的核心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主抓中央军队工作，不仅战争年代战功赫赫，而且在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去世之后，面对“四人帮”的阴谋夺权，叶剑英元帅力挽狂澜，在粉碎四人帮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深受党、军队和人民的敬重。

许多知情者深情回忆过叶剑英元帅负责和关心周总理癌症治疗的事情，特别是周总理住进 305 医院后，叶帅更是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其所作所为令很多读到的人感动。雷厉风行又情深义重的叶帅，也在 1982 年察觉身体不适，再次令人感叹，人生规律不可抗拒。

1982 年叶帅身体开始不适，入住 301 医院，被查出患有“帕金森氏病”，但程度不高。最初只是走路步幅越来越小，而且不稳。1985 年叶帅肺炎又复发，病情加重，中央接连发了三个病情通告，甚至安排人民大会堂停止一切活动，以备叶帅百年后使用。所幸的是，经过医护人员的尽心抢救和精心护理，再加之叶剑英元帅的自身努力，1985 年叶帅病情开始稳定，甚至撤掉了一直都用的呼吸机。胡耀邦称医护人员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为医护人员庆功。

长期的用药，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身体承受限度渐渐降低，叶帅的身体又开始发出危险的讯号。再次入住 301 医院，除了呼吸道和心肺方面的问题外，医生又在叶帅的尿中发现了白细胞，轻度肾积水，并且在膀胱中发现了 100ml 的白色沉淀物，有人称为“尿碱沉淀”。李炎唐医生经过检查，提出要进行“穿刺造瘘”。一般人接受这个治疗是很简单的事情，毕竟只是一个创伤性操作，但对于叶帅这样的高龄病危重的人来说，其风险颇大。报告家属和中央后，胡耀邦批准实施治疗方案，家属一开始也同意，只是在实施的关键时刻，叶帅的小儿子却犹豫了。最后经过医生的沟通和叶帅女儿叶向真的劝说，小儿子也同意治疗方案。

手术是在叶帅近 60 平米的卧室进行的。虽然只是一个小操作，但医护人员却按大手术准备，只为确保万无一失。手术由李炎唐和周柏铭主刀，心内科、呼吸科、麻醉科各司其职。手术过程很顺利，抽出 150cc 的脓液，经过处理之后，叶帅尿蛋白和体温恢复正常，所有专家都认可了“穿刺造瘘”的治疗方案。

手术过后，叶帅便迎来了其 90 大寿。此后叶帅便一直与身体做抗争。直到 1986 年 10 月 22 日凌晨，叶帅身体中的几乎所有脏器功能衰竭，停止呼吸。当时正值红军长征 50 周年纪念大会，胡耀邦在会上宣布了这一噩耗。29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其革命的一生。

有位老者曾今这么评价过叶剑英元帅：在疾飞的鹰群中，他那纷翻冲天的雄姿，永远激励着我们，他将于山河同在！

所有人的不舍，离开了。告别仪式上，所有医护人员，深鞠三躬，泪流不止。

王震：性情中人无畏无惧

王震将军，是我军的名将，也是我党的名臣才干。说起王震，大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延安的 359 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负责解决了中央机关和八路军总部的吃穿问题，名闻全军。王震还为新疆的建设和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东突分子”现在听到王震的名字都心有余悸。

王震将军是在“四人帮”比较活跃的时候住进了 301 医院。大概也是为了斗争“四人帮”的方便，他形式上是住院，实际是利用住院做掩护，先后联络陈云、邓小平、邓颖超以及其他的领导人到叶剑英的住处共商大计，通报各种情况，观察社会动向，是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者之一。王震是军中老将，江青一伙却有意贬低他，住院只能享受兵团级待遇，他只能住在南楼一层一个单间里。

王震将军比较正直，比较直白的表露自己的情感，林彪出事，“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一天到晚张口就是“他妈的”，令医护人员非常紧张，大家劝他小声点，他反而扯着嗓子喊：“怕什么？无非是掉脑袋嘛！”粉碎“四人帮”后，他把消息通报给受迫害的老同志，高兴时说话依旧带个“他妈的”。王震将军真是个性十足，浑身浩然正气。



图解：王震将军

1981年王震将军例行查体时在尿里发现了5至10个红血球，但却没有任何症状。无痛性红血球正常值是5个以下，如果到了5至10个就要引起注意了，警惕最常见的膀胱瘤。不到半个月时间，王震将军体内的红细胞，增到了15至20个。当时，老首长已经70多岁了，身体虚弱，最主要的身体病症是支气管炎，折磨的老首长经常咳嗽，身体也因此比较瘦弱。支气管不好的人如果实施手术，术中怕麻醉引起呼吸和心功能意外，术后怕出血引起肺部感染。

针对此，301医院的主治医生给中央打报告给王震的夫人汇报，告其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因此采取的预防措施。王夫人只说了一句话：“听你们医生的。”说完，便签字同意手术。检查前，医生向首长报告说：“麻醉效果很好，不用怕。”首长继续用他那种无畏无惧的口吻说：“打仗死都不怕，怕什么？”但是检查结果令人沮丧。在将军体内发现肿瘤。针对肿瘤对首长实施了手术，过程顺利病后没有发现任何不适症状。1983年，首长再次复查时，原病灶部位又长了两个瘤子。医院考虑到这种病容易复发的特点，便对王将军据实以告，并要求首长每半年检查一次。

王震将军沉思后说道：“我得了这种病也活不长了，我辞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你们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王震将军就是这样的心直口快，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一代忠臣，心意可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将军身体恢复的不错，气色也渐渐好起来。

1997年，王震将军因为肺部感染引起的休克而以高龄病逝。301医院的医生们总记得他爱说的那句：“他妈的！”对这位有鲜明性格的将军记忆犹深。

洪学智：积极筹建301医院

提起301医院，有三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周恩来总理，一个是黄克诚将军，另外一个就是洪学智将军。因为301医院是在他们三位领导的具体关怀下成立的。

洪学智将军两次被我军授予上将军衔。他先后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后至新时期军队建设。他曾两度担任后勤部长，在任期间做了很多好事，其中积极组织筹建 301 医院便是一件。

洪老非常关注 301 医院的建设，不仅积极为医院引进人才，并且鼓励医院的医生走出国门，出去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对 301 医院乃至整个总后的知识分子给予了很大的关怀。

80 年代初期，洪老经常在 301 医院查体。一次例行检查中，医生发现了洪老身体存在问题。想给他动手术。洪老开始存在顾虑，不想要手术，并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说：“有人给我介绍注射疗法，有内蒙的，有山东的他们说不通过手术也有办法，你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效啊。”

经过调查之后再做决定是洪老一贯的工作方法，他相信科学。在经过医生的实地调查后否定了此种疗法，相信科学的洪老同意手术。给洪老做手术很顺利，洪老本人和家属都比较配合。给洪老做手术，实际上是 301 医院的医生与洪老的一次科学求证的合作。2003 年“非典”过后，洪老再次住进了医院，人毕竟上了年纪，各种器官开始老化，也慢慢的趋向衰退。洪老一生对革命极其忠诚，从干革命到后勤，洪老样样做得出色，他提出的“少花钱都办事”的思想，现在在全军依然流传；他领导制定的一系列标准和制度，仍被我军应用；他勤俭节约的作风，已成为军队的良好传统。他组织发起的“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的活动，真正为我军边海防后勤建设面貌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图解：洪学智将军

洪老活了 90 多岁，他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去世前，还和医护人员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每天都收看电视新闻，关注国家的建设和军队的发展。

（本文为中国新闻周刊网综编，整理吴文召。参考李炎唐《南楼往事：301 医院保健医生的回忆》整理，301 医院的筹建部分参考《洪学智回忆录》整理。）